

东亚经济合作何去何从？

——从中美日经济实力消长谈起

竺彩华

摘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美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继续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实力相对提升,美日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这一经济实力的结构性变化给东亚经济合作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中国在东亚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使东亚经济的内部凝聚力大大提高,为东亚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在东亚地区具有重大战略利益的关切者,美日不可避免地对可能带来的权力变革心存芥蒂,从而又加大了东亚经济合作的难度,增加了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亚经济合作出现“亚太化”趋势,二是导致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错位和缺位。中国需要正确运用经济实力上升这一最大筹码,内外协调,顺势而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抓住机遇,变被动为主动。

关键词 东亚经济合作 经济实力 区域经济合作 东亚经济一体化

新世纪的头 10 年,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 10 年,也是大国经济关系全面调整的 10 年。在这 10 年里,作为位居全球前三的经济大国,中美日三国的经济增长格局和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中国相对地位的快速上升和日本相对地位的明显下降,美国的相对地位亦呈缓慢下降之势。这种大国相对经济实力的消长,不仅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更对东亚^①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 竺彩华,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37)。

① 本文的东亚指东盟加中日韩。

一、中美日经济实力对比的深刻变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整体进入了一个近 30 年的连续增长大景气周期。在这个大周期中,中美日三国在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简言之,即为日美共同引领增长的 80 年代、美国引领增长的 90 年代和中国引领增长的 21 世纪头 10 年。^①三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使得三国的相对和绝对经济实力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一) 中国:相对优势更加凸显,绝对实力快速增强

在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积极顺应全球化潮流,在改革与开放双轮驱动下获得强劲发展。到新世纪,在美日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停滞的背景下,中国更显示出在经济增长层面的相对优势。如表-1 所示,2001—2010 年的大多数年份,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了两位数的高位。根据简单平均计算,新世纪头 10 年,中国年均实际 GDP 增长率高达 10.49%,分别比美国(1.68%)和日本(0.77%)高出 8.8 个百分点和 9.7 个百分点。

伴随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中国的经济、贸易和投资规模也迅速扩大,金融实力迅速上升。1980 年,中国 GDP 仅占世界 1.8%,到 2000 年则上升至 3.7%,之后更是加速提升,2010 年已升至 9.3%,据预测,2015 年将上升至 12.2%。^②与美日相比,如表-1 和表-2 所示,2010 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美国的差距仍较大,仅占其 40%。贸易方面,2004 年中国贸易规模超过日本,2009 年超过德国成为第二大贸易国,2010 年贸易规模已非常接近第一大国美国,且是日本的 2 倍多。投资方面,自 2009 年开始,中国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 FDI 流入国,更是数倍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尽管起步晚,但发展迅速,2010 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德、法、英之后的第五大投资国。外汇储备方面,自 2006 年开始,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到 2010 年中国外汇储备已高达 2.8 万亿美元,是日本(1 万亿多美元)的 2.7 倍多。在美国国债投资方面,自 2008 年开始,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者,到 2010 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占其发行总额的 26% 多,日本占比则下降至 20%。此外,中国于 2008 年成为 G20 成员,2010 年又获准在 IMF 增加份额。以上种种,无不显示中国经济的绝对实力正在快速增强。

^① 根据笔者计算,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 3.2%,其中日本的年均贡献率最高,达 20.1%,美国次之,为 19.4%,而中国只有 9.3%;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 3.0%,其中美国的年均贡献率达到了近 30%,中国的年均贡献率仍为 8.8%,而日本则骤降至 7%。——数据来源:IMF 数据库。

^② 数据来源:IMF 数据库,根据汇率计算。

表-1 中美日经济增长、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比较(2000—2010)(单位:10亿美元)

年份	实际经济增长			经济规模(GDP ¹)			贸易规模		
	中国	美国	日本	中国总值	中美比	中日比	中国总额	中美比	中日比
2000	8.4	4.1	2.9	1 198.5	0.12	0.26	474.3	0.23	0.55
2001	8.3	1.1	0.2	1 324.8	0.13	0.32	509.7	0.27	0.68
2002	9.1	1.8	0.3	1 453.8	0.14	0.37	620.8	0.33	0.82
2003	10.1	2.5	1.4	1 641.0	0.15	0.39	851	0.42	1.00
2004	10.1	3.6	2.7	1 931.6	0.16	0.42	1154.6	0.49	1.13
2005	11.3	3.1	1.9	2 256.9	0.18	0.50	1421.9	0.54	1.28
2006	12.7	2.7	2	2 712.9	0.20	0.62	1760.4	0.60	1.44
2007	14.2	2	2.4	3 494.2	0.25	0.80	2176.2	0.69	1.63
2008	9.6	0	-1.2	4 520.0	0.31	0.92	2563.3	0.74	1.66
2009	9.1	-2.6	-6.3	4 984.7	0.35	0.98	2207.2	0.83	1.95
2010	10.3	2.8	4.3	5 878.6	0.40	1.07	2972.8	0.92	2.04

注:此处 GDP 按美元现价计算。

数据来源:2010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日本贸易振兴会、日本内阁府和美国经济分析局相关网站,其他年份数据来源于IMF《世界经济展望》2010年10月版数据库和WTO数据库。

表-2 中美日投资和金融实力比较(2000—2010)(单位:10亿美元)

年份	吸收 FDI			对外 FDI			外汇储备 (至历年底)		美国国债(至历年底)		
	中国	中美比	中日比	中国	中美比	中日比	中国	日本	发行总量	中国持有	日本持有
2000	40.7	0.13	4.89	0.9	0.01	0.03	165.6	347.2	1 015.2	5.94%	31.29%
2001	46.9	0.29	7.51	6.9	0.06	0.18	212.2	387.7	1 040.1	7.56%	30.56%
2002	52.7	0.71	5.71	2.5	0.02	0.08	286.4	451.5	1 235.6	9.58%	30.60%
2003	53.5	1.01	8.46	2.9	0.02	0.10	403.3	652.8	1 523.1	10.44%	36.16%
2004	60.6	0.45	7.76	5.5	0.02	0.18	609.9	824.3	1 849.3	12.05%	37.31%
2005	72.4	0.69	26.09	12.3	0.80	0.27	818.9	828.8	2 033.9	15.24%	32.94%
2006	72.7	0.31	-11.18	21.2	0.09	0.42	1 066.3	874.6	2 103.1	18.87%	29.62%
2007	83.5	0.31	3.70	22.5	0.06	0.31	1 528.2	948.0	2 353.2	20.30%	24.70%
2008	108.3	0.33	4.43	52.2	0.16	0.41	1 946.0	1 003.3	3 077.2	23.64%	20.34%
2009	95.0	0.73	7.96	56.5	0.23	0.76	2 399.2	996.6	3 685.1	24.28%	20.78%
2010	105.7	0.46	-84.52	59.0	0.21	1.21	2 847.3	1 035.8	4 439.6	26.13%	19.87%

数据来源:UNCTAD 数据库、中国外汇管理局、日本财务省和美国财政部相关网站。

(二) 美国:绝对实力优势依旧 相对地位逐步降低

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经济实力在世界上仍然占有绝对优势地位,2010年经济总量达14.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24%,是中国的2.5倍,日本的2.7倍。^①目前,美国仍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尤其是第一大进口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和对外投资国;尽管美元作为唯一世界货币的地位不存在了,但仍是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仍居于主导地位。但也不可否认,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地位处于下降趋

① 数据来源:IMF数据库,根据汇率计算。

势,经济总量2001年还占世界的32.2%,之后便逐年下降,到2010年这一比重已下降到23.6%,10年间下降了8.6个百分点。据IMF预测,到2015年这一比重将进一步下降到22%。^①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对以美元霸权为中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呼声日趋高涨,G20的应运而生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日渐式微。

(三) 日本:相对优势丧失殆尽,绝对实力加速弱化

日本经济在战后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前期,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长接近10%,1966年经济规模赶超英国,1967年赶超法国,1968年赶超西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成为亚洲新巨人,其经济发展成就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之一,外汇储备在很长时间里位居世界第一。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受泡沫经济破裂和东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1992—1999年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仅为0.5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1%。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国际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在很多领域的绝对实力也加速弱化。2000年日本GDP总量占世界比重14.5%,之后逐年下降,到2010年已降至8.7%,到2015年将降至8%。^②2004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被中国赶超,在世界位次降至第四;2006年外汇储备总额被中国赶超,失去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的地位;2008年持有的美国国债被中国赶超,降为美国的第二大国债债主;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被中国赶超,尤为重要的是经济规模被中国赶超而降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二、中国经济实力上升推动东亚经济合作

东亚经济合作离不开市场与制度的驱动。作为东亚地区大国,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以及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一方面通过市场力量为东亚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主要表现为区域经济凝聚力的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力的提升和区域分工格局的优化;另一方面中国对东亚经济合作制度化方面的追求也为本地区合作注入了推动力,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其进程。

(一) 区域经济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表明,相互贸易和跨境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条件。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带动了东亚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也大大提高了区内贸易和投资的比重,减少了对区外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过度依赖。

从贸易方面来看,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极大地带动了东亚各国对中国的出口,同时也减弱了东亚各国对美日出口市场的依赖。如表-3所示,进入21世纪以

^① 数据来源:IMF数据库,根据汇率计算。

^② 数据来源:同上。

来,中国在东亚出口市场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00年东盟和日韩向中国出口仅869亿美元,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仅8%;之后对中国的出口连年大幅增长,到2010年12国向中国出口额上升至4697亿美元,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上升至20.5%。同期,美日在东亚出口市场中的地位则不断下降,2000年日韩和东盟向美国出口高达2743亿美元,占12国总出口的25.3%;而到2010年,出口额降至2641亿美元,占比降至11.5%。美国在东亚出口市场中的地位下降了13.8个百分点。即使包括中国在内,美国在整个东亚出口市场中的地位也大幅下降,2000年美国市场占整个东亚13国出口的30.4%,而到2010年这一比重已下降到23.7%。日本亦是如此,2000年中韩和东盟向日本出口1433亿美元,占12国总出口的比重高达16.8%;到2010年,12国向日本出口占比下降至9.1%。目前,中国已成为日本、韩国和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东亚各国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仍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

表-3 中美日在东亚出口市场中的地位变化(2000—2010)

年份	东亚向中国出口占东亚总出口(不含中国)的比重	东亚向日本出口占东亚总出口(不含日本)的比重	东亚(不含中国)向美国出口占东亚总出口的比重	东亚(含中国)向美国出口占东亚总出口的比重
2000	8.02%	16.79%	25.32%	30.39%
2001	9.50%	16.75%	25.19%	29.37%
2002	11.48%	14.87%	23.61%	28.69%
2003	14.43%	13.77%	20.40%	27.96%
2004	15.81%	12.99%	18.71%	26.46%
2005	16.43%	11.92%	17.91%	25.74%
2006	16.94%	10.82%	17.09%	25.12%
2007	17.74%	9.64%	15.11%	24.46%
2008	17.32%	10.06%	13.10%	24.19%
2009	19.35%	9.14%	12.28%	23.79%
2010	20.52%	9.11%	11.54%	23.73%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日本贸易振兴会;美国经济分析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关统计。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日本在东亚出口市场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但由于中国地位大幅度提升,因此,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一直保持了较高水平。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通商白皮书,东亚(ASEAN+6)在1990年的区内贸易比重为41%,到2000年则已上升到53%,此后东亚区内贸易一直维持在55%上下。^①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也带动了区内投资的持续活跃,东亚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双向投资持续增长。以东亚两大投资国日本和新加坡为例,2000年日本对华投资9.3亿美元,仅占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3%,到201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上升至72.5亿美元,占当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12.7%,目前中国已是日本第二大投资对象国(仅次于

^① 数据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通商白皮书,第161页。

美国);^①中国更是新加坡对外投资的首选地,2003 年对中国投资的存量就达到了 198 亿美元,占其总对外投资存量的 12.9%,到 2009 年对中国投资的存量上升至 542.6 亿美元,占比进一步升至 16%。^②同时,中国对东亚的投资也在迅速增加,尤其是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的签署,为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2003 年对东盟直接投资还仅有 2.25 亿美元,而到 2010 年对东盟直接投资就已上升至 25.7 亿美元,在 8 年间增加了 10.4 倍,目前,中国对东盟累计投资已超过 100 亿美元。^③

(二) 区域经济增长力进一步提升

作为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的地区,东亚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如表-4 所示,日韩的出口依存度在最近几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日本由 2001 年的 9.9% 上升至 2010 年的 14.1%,同期韩国则从 29.8% 上升至 46.3%;东盟 5 国^④的出口依存度在最近几年虽有所下降,但到 2010 年仍保持了 61.4% 的高位。

表-4 东亚国家的出口依存度(2000—2010)

年份	ASEAN5	日本	韩国
2000	83.88%	10.27%	32.30%
2001	77.16%	9.85%	29.81%
2002	71.32%	10.64%	28.21%
2003	73.37%	11.16%	30.11%
2004	78.74%	12.28%	35.16%
2005	81.09%	13.07%	33.66%
2006	78.63%	14.82%	34.20%
2007	73.78%	16.32%	35.41%
2008	71.59%	16.01%	45.31%
2009	59.05%	11.54%	43.67%
2010	61.42%	14.10%	46.31%

资料来源:WTO 数据库、IMF 数据库。

21 世纪开局 10 年,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东亚各国(除了日本和文莱)的经济增长率都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从 2000 年到 2010 年,按算术平均计算,世界实际 GDP 年均增长率为 3.73%,而中国则达到了 10.29%,东盟老成员国新、印、马、菲、泰分别达到了 5.99%、5.23%、4.99%、4.81% 和 4.40%,东盟新成员国越、老、缅、柬分别实现了 7.22%、7.04%、10.65% 和 7.94% 的高增长,韩国同期的增长也达到了 4.56%。东亚经济增长的强劲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中国对这些国家进口的大幅增加。如表-5 所示,2000 年日本、韩国和东盟 5 国

① 数据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

② 数据来源:新加坡统计局。

③ “高虎城:中国对东盟累计直接投资突破 100 亿美元”,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04-08/2960410.shtml 2011 年 7 月 11 日登录。

④ 即东盟 5 个创始国: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对华出口增加额分别为 77.5、59.8 和 65.9 亿美元,占其 GDP 增长额的比重分别为 5.97%、13.87% 和 23.99%;到 2010 年三者对华出口增幅分别扩大至 457.7、358.5 和 446.7 亿美元,占其 GDP 增长额的比重也分别上升至 22.13%、61.82% 和 44.62%。

表-5 中国进口增幅占东亚国家 GDP 增幅的比重(2000—2010) (单位:10 亿美元)

	对华出口增加额 占日本经济增长额比重			对华出口增加额 占韩国经济增长额比重			对华出口增加额 占东盟 5 国经济增长额比重		
	出口 增加额	GDP 增长额	比重	出口 增加额	GDP 增长额	比重	出口 增加额	GDP 增长额	比重
2000	7.75	129.78	5.97%	5.98	43.13	13.87%	6.59	27.49	23.99%
2001	1.29	7.52	17.11%	0.18	19.28	0.93%	0.89	13.01	6.87%
2002	10.67	10.24	104.20%	5.18	38.43	13.48%	7.77	25.76	30.17%
2003	20.68	58.97	35.07%	14.56	17.55	82.95%	15.68	33.02	47.49%
2004	20.18	123.01	16.40%	19.12	31.88	59.98%	14.63	38.59	37.91%
2005	6.08	86.37	7.04%	14.57	32.16	45.31%	11.92	39.47	30.21%
2006	15.31	87.18	17.56%	12.96	46.87	27.65%	14.58	48.94	29.79%
2007	18.23	101.06	18.04%	13.98	50.97	27.43%	17.92	64.79	27.66%
2008	16.70	-57.52	-29.03%	8.40	20.92	40.15%	7.30	56.97	12.82%
2009	-19.71	-337.54	5.84%	-9.61	1.63	-590.10%	-11.07	20.91	-52.94%
2010	45.77	206.83	22.13%	35.85	57.99	61.82%	44.67	100.10	44.62%

资料来源:中国对各国进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海关统计,各国 GDP 数据来自 IMF 的 WEO 数据库 2011 年 4 月。

另外,中国对东亚各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体现在其对这些国家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上。中国外贸总体上保持了较大的贸易顺差,但顺差主要来自中国香港和美国、欧盟等,而对东亚国家,中国则都是逆差,且逆差有不断扩大之势。如表-6 所示,韩国、日本和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地),2010 年中国对韩国、日本的贸易逆差分别达到了 696 和 557 亿美元的历史高位,与东盟的逆差重又攀升至 164 亿美元的高位。不断扩大的逆差显示,中国经济对拉动东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表-6 中国与美国、东亚贸易盈余变化(2000—2010)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国总贸易盈余	与美国盈余	与日本盈余	与东盟盈余	与韩国盈余
2000	241.1	297.4	1.4	-48.4	-119.2
2001	225.4	280.8	21.6	-48.4	-108.7
2002	304.3	427.1	-50.3	-76.3	-130.4
2003	254.7	586.0	-147.4	-164.0	-230.4
2004	321.0	802.9	-208.2	-200.8	-344.4
2005	1020.0	1142.7	-164.2	-196.3	-417.1
2006	1774.7	1442.6	-240.8	-182.2	-452.6
2007	2622.0	1633.3	-318.8	-141.9	-476.6
2008	2954.6	1708.6	-345.2	-28.3	-382.3
2009	1960.6	1433.7	-330.3	-4.1	-488.8
2010	1831.0	1812.7	-556.5	-163.6	-696.3

资料来源:2006 年前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及以后数据来自中国海关统计。

基于上述事实,世界银行对中国的态度也不自觉地发生了转变。在其 1993 年出版的《东亚奇迹》中,中国并未被作为研究对象,说明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影响还未引起世行的足够关注;但在 2005 年的《东亚复兴》报告中,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理解东亚复兴的“核心问题”。^①

(三) 区域分工格局进一步优化

中国经济不断增强的地区影响也体现在其对东亚区域分工格局的影响上。在上个世纪很长时间内,东亚地区一直保持以“雁型结构”为特点的地区分工模式,即由日本和新兴工业经济体向东亚其他国家提供高质量的零部件和资本品,再由这些国家组装成最终产品,最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市场。但自上世纪末,东亚开始形成更为复杂的区域生产网络。虽然新的区域生产网络由雁型分工结构演变而来,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产业间分工的本质属性,形成了一种以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区域生产与分工结构。

在推进东亚区域分工结构转变的诸多因素中,除了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所导致的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整合、信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单位成本降低以及东亚地区整体开放宽松的政策环境外,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其成为国际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且在产业结构上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即一方面,在东亚地区继续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的优势;另一方面,也积极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双头并进的产业发展模式,加上跨国公司投资战略的推动,逐渐打破了东亚地区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产业转移模式,也改变了东亚以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为梯度的转移层次(即“雁型模式”),转而形成了以中国为枢纽和最终装配中心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最典型的就是以机电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内分工逐渐取代了雁型模式下的产业间分工体系,产业内分工在以垂直型工序分工为主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依据价值链和价值实现来进行水平分工的新动向,即逐步显现由垂直分工向网络化水平分工升级的态势。^②同时,以零部件贸易为主的区内贸易也得到了迅速发展。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种趋势更是有增无减。区域生产网络内的零部件贸易增长速度要远快于全球制造业的贸易增速,东亚地区对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式的依赖也相应的远甚于世界其他地区。这种网络内贸易也毫无疑问地加强了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中国则依旧发挥着首要的最终装配中心的作用。^③

可以预见,伴随经济结构转型和国内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国对东亚地区最终产品的吸纳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届时庞大的中国国内市场将进一步带动区内要素的流动和分工的优化,同时本地区受外部市场冲击的脆弱性也会大大降低。

^① 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黄志强、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8 年,第 46 页。

^② 张红霞《东亚地区产业分工模式的演进及中国的对策》,《东北亚论坛》2006 年第 5 期。

^③ Prema-chandra Athukorala,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rade Patterns in East Asia: Region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 10, No. 1, Winter/Spring 2011, pp. 65—95.

(四) 区域合作推动力进一步强化

中国国内市场的迅速扩张及其对主要贸易伙伴吸引力的迅速增强,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影响力,因而也增加了其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博弈中的分量。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东亚经济合作有了很大进展,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的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率先开展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为加速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程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竞争效应。

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远远滞后于欧盟和北美。危机的爆发,一方面让东亚各国发现:在全球化不断提速导致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空前加大的背景下,各自为政无法抵御风险;没有协调互助还会导致危机恶化;依赖IMF等国际组织,既不能避免风险,也不能摆脱危机。东亚各方从惨痛教训中得到启示:只有加强区内合作,才能增强抵御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整体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为急需外汇的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强有力的支持举措使中国成为地区经济的稳定力量,也塑造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随后中国与东盟展开合作提供了经济和政治基础,更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诚信基础。2001年中国领导人大胆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设想,得到了东盟的积极响应。次年11月,中国即率先与东盟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这一举措直接刺激了日本、韩国各自与东盟的自贸区谈判和建设进程。自此,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10+1”、“10+3”和东亚峰会、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多元合作框架并存的局面。中国在推动东亚经济合作和地区一体化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通过加强与东盟合作从而带动东亚经济合作一直是中国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为此,中国与东盟的“10+1”合作在多组“10+1”中合作最深、最实。从2004年的“早期收获”到2010年初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双方共同市场潜力得到进一步挖掘,人员、商品、资金流动大幅增加,我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国—东盟中心成立,成为促进双方经贸、教育、旅游、文化等领域的重要服务平台。同时,我国结合东盟需要,积极展开互联互通合作,推进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连接老挝、泰国的跨湄公河大桥将于2012年竣工,届时昆曼铁路将实现全线贯通,成为联通中国与东南亚的大动脉,对促进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及其他领域合作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东盟高级官员曾表示,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机制数量已超过所有其他对话合作伙伴,中国已成为东盟最重要战略伙伴之一。

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最甚时,中国再次加强与东盟合作,发挥了地区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中国政府承诺设立总规模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用于基础设施、能源资源、信息通信等领域重大投资合作项目;在3至5年内,向东盟提供150亿美元的信贷,包括17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支持双方实施合作项目;向柬埔寨

寨、老挝、缅甸提供总额为 2.7 亿元人民币的特别援助,帮助三国克服困难;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增资 500 万美元,促进双方各领域的合作;为“东亚大米紧急储备”项目专储 30 万吨大米,加强东亚粮食安全;在未来 3 年内为东盟国家培训 1000 名各类农业技术人才;在未来 5 年内向东亚峰会中的发展中国家新增 2000 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提供 200 个公共管理硕士奖学金名额,向“10+3 合作基金”捐款 90 万美元等。^①

除了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中国也积极推动中日韩和“10+3”层面的合作。早在 2002 年的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就率先提出了签署三国 FTA 的建议。此后中国一直积极推进中日韩 FTA 合作进程,在 2011 年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宣布将在年内完成自贸区谈判的官产学联合研究并于 2012 年启动自贸区谈判,尽早就三国投资协定达成实质性共识。截至 2011 年 10 月,三国已建立外交、科技、经贸、环保、知识产权、海关等 17 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 50 多个工作层交流合作平台,机制化建设稳步加强。2011 年 9 月,三国合作秘书处正式挂牌。在“10+3”层面上,中国积极促成了东亚外汇储备库^②的建立,为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美日经济实力下降掣肘东亚经济合作

东亚特殊的地缘条件决定了它必然是大国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的重心,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为此必然受到这种复杂地缘政治(在经济上由依赖美日转向依赖中国,而在安全上则仍依赖美国)的影响。由于中国崛起对东亚产生巨大影响并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东亚地区和世界的权力结构,作为重大战略利益关切方,美日也就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可能带来的权力变革心存芥蒂。正如《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中国崛起之威胁”称,“中国的上升与美国的下滑形成强烈对比……由于对中国具备攻击性的害怕和猜疑,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③曾经的世界第二、东亚第一经济强国日本,目前在经济实力上正处于与中国“错肩”阶段,其心态也是很复杂甚至是扭曲的。因此,与中国经济实力上升为东亚经济合作提供动力相对应,美日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为东亚经济合作提高了难度,增加了制约因素,其主要表现之一是东亚经济合作出现“亚太化”趋势,之二是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错位和缺位。

^① “杨洁篪通报我政府加强中国东盟全面合作设想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gzdt/2009-04/12/content_1283543.htm 2011-07-20。

^② 2007 年中国提出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并得到各方积极响应。2009 年 1200 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库建成,尽管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但中国仍然同意与日本持有同样的份额(中日分别出资 384 亿美元,韩国和东盟分别出资 192 亿和 240 亿美元),显示了中国在推动这一倡议方面的诚意。

^③ “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 *The Economist*, December 2, 2010.

(一) 主渠道之争:东亚还是亚太?

20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合作发端的主要促进因素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欧洲单一市场的扩大和深化,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陷入停滞。因担心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东亚国家不再满足于作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员^①而开始提出自身的区域合作倡议。1996年在泰国召开的第一届亚欧会议上,“10+3”成员国第一次在国际场合集体亮相。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则正式开启了“10+3”合作机制,因为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东北亚和东南亚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东亚国家在未来类似的危机中也不可能指望其他地区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从此,“10+3”即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渠道。2001年,“10+3”会议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报告,为东亚地区合作勾勒出发展蓝图。2004年在老挝举行的第八次“10+3”领导人会议,确定东亚共同体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并决定2005年在吉隆坡召开首届东亚峰会和启动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②以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东亚峰会给予人们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深度发展以无限遐想,东亚经济合作似已走上快速通道。但随后在美日的干预和参与下,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反地区”因素逐渐增多并开始出现“亚太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区内和区外两个层面。

在区内层面,原本期望提升“10+3”机制的“东亚峰会”被“10+6”、“10+8”搅局。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合作首先需要有地理概念,越是临近的区域越容易成功,^③才能真正实现“团结就是力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走过的共同体道路已经证明,区域合作开始时由几个近邻国家首先发起,便于统一意志、合作与发展。中国主张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坚持以“10+3”框架主导东亚合作,但这一模式却引起美日的担忧。美国从来也不希望在亚洲地区再出现一个类似欧盟的组织,更不希望出现一个可能由实力日益增强的中国主导的地区组织,而日本则担心中国在这一框架中的影响力过大。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代言人”,日本便极力鼓吹如果东亚峰会在“10+3”框架下进行,未来很可能被中国主导,因而主张东亚峰会扩大化,先是提出邀请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在这一提议被有关各方拒绝后,又提出邀请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入会。^④因此,首届东亚峰会便打破了“10+3”框架,

^① 亚太经合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发展确实为东亚国家提供了区域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最佳机制,尤其1994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为东亚国家享受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带来的收益提供了保障,但90年代中后期,亚太经合组织失去了发展和前进的动力。参见威廉·W·凯勒、托马斯·G·罗斯基主编《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刘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3页。

^② “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hdqzz/lhg_13/。

^③ 从理论上来说,区域经济合作中对“区域”概念的强调主要在于地理上临近的国家在经济和人员交往上的成本低,由此从一体化中所获得的收益会更大;否则,远距离的运输成本本身就会使很多商品成为非贸易品,从而使一体化的成效大打折扣。

^④ 《东亚峰会引发外交角力,“船老大”东盟忙平衡》,新华网,2005-12-12,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2/12/content_3908530_1.htm。

而成为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10+6”模式,范围扩大到南亚和大洋洲。此举一方面稀释了中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迎合了美国的需要,符合日本巩固美日同盟的需要。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为了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力推“重返亚洲”战略,直接加入东亚峰会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其插足东亚事务的最佳平台。2010 年美国如愿让第 43 届东盟外长会议决定扩大东亚峰会机制,2011 年美俄正式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国。“大国集聚”的东亚峰会显然增加了东亚经济合作的掣肘因素,主要表现在:(1)美俄等大国的引入,使得各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更加纷繁复杂,必然加剧东亚峰会的内耗与分化,降低效率;(2)美、俄、澳、新、印都非严格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其加入使东亚峰会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泛化”有余而自主不足,尤其美国的参与显然使东亚峰会(东亚共同体)将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翻版。^①(3)东亚的各种合作机制将更加繁冗和错综复杂。目前东亚的合作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ARF)、中日韩与东盟的 3 个“10+1”、中日韩与东盟的“10+3”、从“10+6”发展到“10+8”的东亚峰会、APEC 等等。美国加入后可能力推的种种协定与机制,将使得现有的区域平衡与机制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此,有学者认为,东亚峰会可能成为一个“反地区”因素,其使命就是要防止出现一个亚洲人的东亚地区共同体。^②

在区外层面,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则直接在外围与东亚经济合作的“10+3”主渠道相竞争。由于东亚峰会一贯的“东盟主导”方式以及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对美国主导东亚事务形成一定约束,所以美国在极力反对东亚地区形成一个排他性的内部联合体的同时,也一直在试图通过重振 APEC 强调其在东亚的影响力,进而从外缘削弱东亚一体化的地理合理性。但 APEC 因其松散的机制而未能如其所愿,TPP 则较好地迎合了美国这一需要。TPP 一开始由文莱、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 4 个国家在 2005 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发展而来,起初并未受到太大关注。但随着 2009 年美国高调加入,如今 TPP 谈判成员国已增至 9 个,^③日本也已经宣布要加入 TPP 谈判。另外美国还在试图说服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等加入 TPP。美国积极推动 TPP 除了要分享亚洲高速增长外,更看重的是掌握亚太区域统合的主导权。作为东亚势力的“平衡者”,美国担心各国过度依赖中国。凭借 TPP 实现“重返亚洲”,与日本及东盟结为一体,是美国的战略重心所在。^④不难想象,一个由美国主导、横跨亚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很有可能覆盖整个东亚地区。TPP 框架的出台,对东亚地区冲击最大的就是东亚人的梦想——东亚共同体,其

① 目前,APEC 包括亚太 21 个国家和地区,今年的东亚峰会即将包括 18 个成员国,其中有 14 个成员国(分别为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文莱、菲律宾)兼为这两个机制的成员国。

② Shaun Breslin, “Comparative Theory,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No. 3, 2010, p. 727.

③ 目前 TPP 成员除了美国,还包括智利、秘鲁、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

④ 蔡成平《日本加入 TPP 对中国的影响》,《金融时报》中文网,2011 年 11 月 9 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639。

主要表现:(1) 拉拢东盟。通过 TPP 框架下加强与东盟的经济联系,将更多的东南亚国家纳入到以美国为核心的贸易体系中,从而在经济上强化这些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在政治上进一步介入东南亚事务,牵制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2) 牵制日韩。最近两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释放出了建设中日韩自贸区和重建东亚共同体的积极信号,但日韩同时也与美国展开了关于加入 TPP 的接触,这一左右摇摆的立场,让重启的 FTA 谈判充满了变数。(3) 为难中国。尽管经济发展速度快,但中国仍没有摆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征,而高标准的 TPP 给中国出了难题:不选择加入会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而选择加入将会加剧国内经济已经不能承受之重。在上述情况下,东亚国家已再无可能心无旁骛地去建设各自心目中的东亚共同体了。

(二) 主导权之争:东盟还是其他?

北美和欧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表明,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是保证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顺利发展的基本保障。在北美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中,美国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法德则发挥了核心作用,美国、法德兼为该地区的经济重心。东亚经济的重心明显在东北亚,2010 年中日韩三国的 GDP 合计已达 12.34 万亿美元之巨(其中中日分别为 5.88 万亿和 5.46 万亿美元,占到世界的 19.6%),而东盟 2010 年 GDP 总值仅为 1.85 万亿美元。^①单从经济层面来看,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非中日(或中或日或两者)莫属。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合作大都围绕非经济重心的东盟而展开,不管是“10+1”、“10+3”,还是东亚峰会,都发端于东盟首脑会议,东盟发挥着主导者的作用。当前东亚经济合作出现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与其主导权的错位和缺位密不可分。

从东亚区内来看,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导致中日缺乏互信,且中国迅速崛起让日本担忧东亚合作的主导权旁落,因此双方未能携手共同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针对“10+3”的“10+6”框架的出台,就是日本在与中国争夺区域合作主导权问题上信心不足的反映。^②另外,日本对美国主导的 TPP 表现出浓厚兴趣,也与其国际经济地位下降和中国崛起不无关系。从东亚地区的双边 FTA 发展来看,中国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快,目前已与 9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 FTA 协议,与 6 个国家和地区的 FTA 正在谈判中,^③其中中国—东盟 FTA 在 2010 年 1 月正式启动,与中国台湾的 ECFA 于 2010 年 9 月生效,另外中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的 FTA 进程也走在了日本的前面,与韩国的 FTA 谈判也即将启动。面对中国双边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的局面,日本外务省官员认为中国以 FTA 为跳板扩大了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参加 TPP 谈判,改变日本 FTA 落后的局面,与中国抗衡。尤其面临中国崛起、

^① 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1,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1/01/weodata/index.aspx>, 2011 年 8 月 1 日登录。

^② 王玉主《中日之争与东亚合作:以 10+3、10+6 为主的分析》,《创新》2010 年第 3 期。

^③ 资料来源: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http://fta.mofcom.gov.cn/index.shtml> 2011 年 8 月 16 日登录。

中日关系因钓鱼岛撞船事件再次出现政冷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日本也欢迎美国重返亚洲,并希望通过参加 TPP 来表明支持美国以重修和巩固日美同盟,增加其与中国抗衡的砝码。^①同时,韩国分别与世界两大经济区欧盟和美国签署了自贸区协议,使得韩国可以与占全球经济 60% 的地区进行自由贸易。这一发展动向也给日本带来很大压力,从而也大大推进了日本加入 TPP 的政治决心。

从超越东亚的视角来看,东亚合作的主导权之争背后也反映了美国的干预和控制。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是通过保持美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来实现的,而美国的主导地位又是通过特定的地区安排而得以保证的”。^②与日本、韩国等双边结盟是美国自二战以来保障其东亚战略利益的最重要安排。但随着东亚地区经济尤其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整个地区分工联系的日益密切,区域合作的要求也开始出现。为此,美国的意图非常明确:绝不允许东亚出现一个没有美国主导和参与的地区组织。1990 年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设想便无情地遭到美国扼杀,同时美国还试图通过 APEC 平台从经济上将东亚整合到其主导的合作进程中。但由于 APEC 在应对危机面前表现欠佳而对东亚失去吸引力,致使之后东亚经济合作有了快速发展。尽管试图把东亚纳入自己主导的区域合作安排受阻,但美国并不甘心,仍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东亚合作亚太化,要么把原本仅限于东亚的“10+3”框架稀释为亚太范畴的“10+8”,要么推出 TPP 吸引东亚国家加入以削弱东亚目标的凝聚力。其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国通过主导区域合作“坐大”,在这一点上,美日的意图是不谋而合的。

东亚经济合作主导权的错位在本质上就是缺位,即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实质上并没有真正的主导者,一个既在本地区有足够的经济号召力,又能够站在东亚立场、代表东亚利益的主导者,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专事大国平衡战略的东盟,这也正是东亚经济合作至今仍远远落后于欧洲和北美的真正原因。东盟主导是东亚经济合作的现实选择,准确地说,是中美日大国在东亚角逐、博弈的无奈结果。但“小马拉大车”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第一,由于缺乏经济影响力,东盟实际上是被各方力量拉拢利用的对象,而不能调动各国投入到本地区的一体化事业中来;第二,东盟的大国平衡外交,刺激了大国在本地区的明争暗斗,反过来,大国也成为东盟实现其平衡战略的筹码,致使大国在东亚一体化议题上更加难以进行深度合作;第三,东盟自身一体化仍未实现,凝聚力存在一定挑战,尤其成员间巨大的发展差距以及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差异,对东盟在 2015 年建成共同体的目标构成障碍;第四,作为启动东亚合作进程的东盟,在建立东亚共同体上并不主动,至少在完成自身的目标之前,甚至在此之后,不会主动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③但无论如何,“小马拉大车”仍是当前东亚合作的次优选择。

① 刘昌黎《日本参加 TPP 谈判的动因及其制约因素与政策措施》,《日本学刊》2011 年第 1 期。

② 吴心伯《美国与东亚一体化》,《国际问题研究》2007 年第 5 期。

③ 张蕴岭《对东亚合作发展的再认识》,《当代亚太》2008 年第 1 期。

四、中国的战略选择

目前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深度变革和调整,各主要经济体正在重塑国家实力,一场新的全方位综合国力竞赛正在全球展开,其中以各种区域合作架构为载体的权益之争仍会继续。目前的东亚经济合作去向何处?中美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给出明确答案。面对中美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变化给东亚经济合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东亚地区演变的复杂局面,中国对此必须客观认识,正确运用中国经济实力上升这一最大筹码,内外协调,顺势而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抓住机遇,变被动为主动。

(一) 尽快转换为内需主导的经济模式,降低对外依存度

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引起全球瞩目的同时,也招致了某些强国没有正当理由和客观依据的“恐惧”,并表现出严重的病态心理,美国和日本就是这种病态心理的代表。尤其在当前以美欧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深陷财政、金融、经济三重危机和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对中国有利的任何趋向都会引起西方国家的警惕,甚至会不惜制造摩擦和麻烦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6年(1995—2010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5年(2006—2010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①2011年更是中国遭遇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发之年。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局面的产生与我国长期外贸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作为大国,这一模式不可持续,一方面对外部市场的过于依赖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摩擦,加大了对外经贸战略的实施难度。中国区域战略的实现,仍有赖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有赖于中国继续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拉动作用。因此,中国必须练好内功,加快向内需型经济转型,一个正在成长的14亿人口的大市场将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最大筹码。

(二) 继续充分利用自身市场优势,做实东亚,观望 TPP

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多大国、多角色特征造成了目前东亚合作的多层框架结构,多种区域合作机制并行发展,各有所长,都为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挥着积极作用。为此,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本地区多层次、全方位的经济合作。但同时,“周边是首要”,中国还必须做实东亚,在“10+3”框架下多做文章,继续把它作为参与和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主渠道,尤其要大力推动中日韩合作和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性安排如“10+3”自由贸易区(或东亚

^① 《中国连续16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新华网,2011年9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19/c_122051480.htm。

共同体^① 则不必牵强, 可以作为一个长远的愿景, 待到时机成熟时自然水到渠成。

面对 TPP 的挑战, 中国应稳住阵脚, 冷静应对, 而不必急于加入。中国不断成长的巨大市场, 就是中国做实东亚、应对 TPP 的最大筹码。据商务部初步预计, 未来五年中国进口总规模要达到 8 万亿美元。^② 无论日本、韩国、东盟都不可能放弃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利益, 而没有中国加入的 TPP 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其主导国家美国(若加上日本也一样) 经济增长乏力, 失业问题严重, 国内反对自由贸易的声音此起彼伏, 因此谈判的难度是很高的。再加上还要拉入越南等落后国家, 要实现如美国所倡导的“高标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是难上加难。因此, 未来 TPP 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各参与国对 TPP 的热情, 虽可以被一时的政治热情鼓噪起来, 但真正的推动力量还是企业和民众从自由贸易中获得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以日本为例, 美日经济结构相似, 竞争性很强, 贸易潜力有限; 而中日经济结构互补性很强, 贸易发展潜力巨大; 再加上距离引起的物流和人流成本上升的原因, 与中日韩自贸区相比, 日本加入 TPP 的贸易效应是微乎其微的。

(三) 寻求跨区域经济合作 加强与欧盟、拉美、非洲地区的合作

严格意义上说, 区域经济合作仅限于具有地缘优势的相邻国家和地区。但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 跨区域的经济合作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目前中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大多在亚太地区, 然而种种因素导致现阶段亚太(包括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十分缓慢。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思路还需要突破地缘限制, 将参与亚太(东亚)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贸易安排并列起来, 根据国内的战略发展需要来选择区域经济合作伙伴, 与友好国家或有战略利益的国家达成区域贸易协定。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很强, 而拉美非洲地区未来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因此, 与发达国家和拉美非洲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对双方都有益处, 也应是今后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 李 丹)

^① 国内学者认为, 对于“东亚共同体”中国有自己的理解。中国理念的“共同体”可能主要是一种协商、协调、合作的和谐地区秩序, 而不一定是一个具有管理功能的超级地区组织。参见张蕴岭《对东亚合作发展的再认识》。

^② “商务部: 未来五年中国进口总规模将达 8 万亿美元”, 人民网, 2011 年 12 月 7 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0846/16527750.html>。